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7.01.023

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思维方式的转变

季惠斌^{1,2}

- (1. 中国医科大学, 辽宁 沈阳 110122;
2. 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 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 大数据技术的兴起引发的人类思维方式的转变已经在改变人类的日常生活方式。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得面临大数据分析的考验,而且大数据分析技术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具备相应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与大数据技术的三个特征相似,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也具备“样本=总体”“允许不精确”和关注“相关关系”的三个特征。当然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也面临着一定的风险,但积极努力地迎接信息时代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思维方式的转变是我们应有的态度。

[关键词] 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思维方式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01(2017)01-0150-06

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前提的中国经济新常态已经步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界,随着国家经济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逐步推进也必然经历一场实质性的变革,而且这种变革更是结合了当前最为时兴的“互联网+”思维,预计将成功开辟一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路径。

在发达国家已经大踏步迈向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时,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更是面临着追赶与超越的双重使命。经济与社会层面出现的革命性剧变必然会引发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重构。经济社会的变革往往伴随着思想革命,这种思想的革命可能发生在经济社会变革之前,亦可能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交融、如影随形。马克斯·韦伯为近代资本主义突飞猛进的发展寻求了一个背后的精神动力,那就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同样,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1]52}因此,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具有向新常态化下的思政教育转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一、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思维方式转变的必要性

(一)新工业革命的崛起正悄悄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

近代以来,世界所经历的三次工业化变革使得人类社会发展的图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前两次工业革命当中,西方发达国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了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奇迹。由此,在制度领域人类社会曾醉心于“资本主义制度”就是一种终极的制度。这一认识主要是被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所击破。遗憾的是中国人在前两次变革的过程中仍然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徘徊往复,最终落得“挨打”的局面。第三次科技革命,由于国内外环境因素的影响我国仍然被置于科技领先的大门之外。时至今日,德国人提出了“工业4.0”的概念,并已将“工业4.0”的思维方式去改造他们引以为傲的传统制造业;美国人于2012年2月正式发布了《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提出了“工业互联网”的核心思维。无论是德国的“工业4.0”,还是美国的“工业互联

[收稿日期] 2016-06-18

[基金项目] 辽宁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专项项目(ZS2013009);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W2015400);辽宁省教育厅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专项项目(ZS2015020);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立项课题(JG16DB501);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立项课题(JG14DB459)。

[作者简介] 季惠斌(1961—),男,中国医科大学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教授,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博士研究生。

网”，都将有赖于当前方兴未艾的“大数据技术”的理论与实践。

(二)当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方式方法、思维模式逐步出现教育效果的边际递减趋势时, 创生新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思维就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 从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上说, 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技的迅速发展, 全球化影响下的国际间交流与合作的增多, 必然“深刻地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与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内容”; 因此,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必须与时俱进, 在实践中探索和创造新的方法。”^{[2]381} 其次, 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上来说, 以新媒体为载体的新兴传播方式对谈话、开会、理论教育等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新媒体是指相对于书信、电话、报刊、广播、电影、电视等传统媒体而言的依托数字技术、互联网络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等新技术向受众提供信息服务的新兴媒体。”^{[3]64-66} 当然新媒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这种来势也有可能转变为未来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新机遇。最后, 思想政治教育自身也面临着现代化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 是一个全面、深刻的变革过程, 也是一个系统整合运行过程”^{[2]458}。思想政治教育观念、体制、内容手段的现代化^{[2]458-461} 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其中, 观念的现代化是前提条件, 这也契合了大数据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思维方式转变的实际需要。

(三)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 就十分注重建设自己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

思想政治教育是这一体系的基本内容和中心环节^[4]。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 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与群众相结合的过程。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逐步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事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宝贵精神财富。但近年来, 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 我们与国际社会交往的内容、方式等都前所未有地增多了; 新媒体的发展, 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拉近了我们与世界的距离; 新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所具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难免受到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 核心价值的认同与个体价值的多元化成为新常态下思想政治教育所要面临的新挑战。另外, 一些西方国家所主导的“普世价值”观念以强有力的姿态侵蚀着我国年青一代的头脑, 加之这些年来党内

以腐败为最大恶劣影响的不利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的事件多发, 难免影响到青年人参与政治的热情。尽管我们从小学到大学都十分注重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和改革开放岁月中所积累起来的崇高形象正受到个体价值观多元化的侵蚀与冲击。“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建立近百年间的苦难和艰险已经渐行渐远”, “新时代的中国人, 理应去体会和理解整日处在兵荒马乱, 忧惧于亡国灭种的前辈们的梦想, 因为这梦想虽已过去, 而其意蕴却有助于面向未来。”^{[5]6} 因此, 如何进一步提升自身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 使得青年一代被吸纳进中国共产党这一优秀的先锋队组织当中, 成为我党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课题。因此, 大数据背景下的青年价值观研究就成为时下研究的热点。如何捕捉到当代青年的思想动态, 运用大数据技术分析他们日常行为方式, 了解他们真正的价值观发展期望就成为新常态下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题之一。

二、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思维方式转变的可能性

实现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思维方式的转变需要具备两个基本前提条件: 一是大数据技术能够分析和预测思想政治教育的诸方面内容; 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思维能够跟上时代节奏的步伐, 或者说能够与当代新技术融合发展。

(一)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思维方式转变的技术性前提

在当代, 数据和信息的争夺正以“风起云涌”之势席卷全球。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和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 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一书中给大数据作出的界定是: “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 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 获得有巨大价值的产品和服务, 或深刻的洞见。”^{[6]4} 人类的生活之所以在信息社会得以彻底的改变, 首先在于我们身边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数据场”, “人类存储信息量的增长速度比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快 4 倍, 而计算机处理能力的增长速度则比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快 9 倍。”^{[6]13} 当今的时代, 数据存储量大约每三年就增长一倍^{[6]14}。如此纷繁复杂而又巨型的数据, 经过计算机、统计等方面的技术专家的分析与开发就能够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价值。其次, 大数据时代有别于小数据时代的抽样分析, 大数据带来的思维变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全数据模式, 样本=总

体”^{[6]37}，数据来源不再依赖于随机样本，而是全体数据；二是“允许不精确”^{[6]46}，对数据的分析和应用不再追求精确性，而是从混杂的数据中找到需要的信息并加以开发利用；三是“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相关关系”^{[6]67}，在做大数据分析和预测时，只需要知道事物“是什么”就已经足够，没必要追求“为什么”。实际的大数据实践中我们不需要知道某种事物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而是通过大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来告诉我们事物“是什么”或即将“是什么”。

综合上述大数据的基本介绍，我们可以明确地知道如今的大数据技术已经“撼动了世界的方方面面，从商业科技到医疗、政府、教育、经济、人文以及社会的其他各个领域。”^{[6]15} 比如时下教育领域方兴未艾的“慕课”，就是近年来国际开放教育领域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支持的一种新的在线课程模式，“具有大规模、免费开放、在线互动、大数据支持等特点。”^{[7]104-108} 因此，可以说将大数据运用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条件已经成熟，关键是如何将这种技术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诸方面进行融合，这成为当下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大数据技术人员跨越彼此专业领域的障碍、实现互联互通的连接点。

（二）基于数据信息时代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数据和信息的争夺已经成为当代国家间竞争的核心内容之一。德国的“工业 4.0”核心在于建立起基于其强大制造业数据之上的“物理信息系统”；美国的“工业互联网”企图占据工业产业链的最高端，掌控数据以求掌控他国。中国政府也提出了“互联网+”的思维。因此，生活数据化是未来社会的一种趋势，而且这种变化正以不可阻挡之势侵袭着每一个人的生活。“大数据是人们获得新的认知、创造新的价值的源泉”^{[6]9}，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在创造新价值过程中，并没有也不可能脱离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些核心范畴，比如思想与行为的基本范畴、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中心范畴、内化与外化的结果范畴、个人与社会的终点范畴等^{[2]17-23}。也就是说，大数据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者需要寻找的是数据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契合点，而非实质性地更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主体与客体等教育的基本方面。

如果单纯从大数据的可能性和相关性来看，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专业性似乎不那么重要了，事实上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者不会消失，“但是他们必须与数据表达的信息进行博弈”^{[6]21}，那种传统

的基于少量、精确信息对人思想和行为所作出的直觉判断必然会让位于因为数据量的无限增大而得出的数据判断。但数据所预示的受教育者的行为趋向只是生硬冰冷的、无感情的对未来的—种事实，借助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对行为者进行教育、干预、辅导等仍然依赖于教育者所从事的专业化教育体验。因此，大数据的开发和利用过程所形成的价值链条当中，数据拥有者、数据分析者、创新思维者^{[6]160} 分别承担的任务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也具备相应的对照。思想政治教育者更多地承担的是思维创新者的角色，因为数据拥有者可能并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人员，抑或没能掌握分析人的思想和行为数据的能力；而数据分析者可能仅仅在整个价值链条中充当中介者的身份。真正起重要作用的是创新思维者，只有教育者在挖掘数据的新价值当中具有专业而又独特的想法^{[6]160}，才能将受教育者的信息输入大数据的分析与预测系统中，从而创造出一整套稳定而可信度高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系统。最终，系统所得出的结果将被运用于对受教育者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干预的过程中，并实现教育的目的。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与大数据的结合在价值链条的三个环节中还可能出现数据拥有者与创新思维者合二为一的情况。因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大多都来自于教育一线，具有收集和創新数据的可能。

三、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思维方式转变的三大特征

与大数据对现代社会所引起的人类思维变革的特征一样，将大数据分析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后，思想政治教育自身也会发生革命性的思维转变。

（一）利用大数据技术，思想政治教育可实现对所有受教育者的关注，而不仅仅是“树立榜样”“突出典型”等个体价值的推崇与警示

以往，教育者总是寄希望于通过一定的小样本数据调研来达到掌握青年价值观的信息，并以此作为衡量受教育者价值观发展水平的标准。但这仅仅是“因为记录、储存和分析数据的工具不够好，我们只能收集少量数据进行分析”^{[6]29}。如今，信息的大量涌现，数据处理技术的大踏步前进，使得人类在处理数据时的有限性得到极大的解放。小数据时代，教育者要了解受教育者的思想动向和行为方式往往需要“亲力亲为”，在比较彻底地掌握单个受教育者的基本情况后才可

能实施教育(心理)干预。但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利用云端存储技术和网络新媒体的数据收集,教育者面前摆放的是千千万万个不同个体的信息,包含受教育者思想和行为的方方面面。因此,大数据不仅仅将教育者从“亲力亲为”的信息收集当中解脱出来了,而且将自己面对的教育对象由单个个体扩充到一定范围内自己能够关注的任何一个受教育者。

“全数据模式,样本=总体”^{[6]37}的思维是大数据分析企求尽可能达到的目标。以往的统计学方法十分注重“随机抽样”的做法,而且这一做法,在人类没有更好的处理数据工具之前长期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随机抽样”代表“总体”的做法往往受制于研究者或者数据采集者能否真正做到“随机”。在“随机”无法消除所有偏见的时候,抽样研究的结果可能与“真理”相去甚远。而且,“采样忽视了细节考察”^{[6]37},尽管抽样分析的统计方法能够使得结果达到我们可以接受的正确率,但“生活中真正有趣的事情经常藏匿在细节之中”^{[6]38},受教育者情绪的波动、行为的异常等也同样隐藏于我们生活中的细微之处,而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连接往往是单线的,这种仅仅对受教育者个体的关注往往使得我们的“发现”具有一定的狭隘性。因此,大数据的出现给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了一个关注“总体”的机会,在众多受教育者中发现新趋向,尽早地做出预设性的判断可能能够避免一些青年成长过程中的“悲剧”发生。

(二)教育者所关注的受教育者数量的大幅增长与受教育者个人数据的大幅增多是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基础

由于受教育者人数的激增、采集的受教育者信息量的不断增多,往往有些“失真”的信息会进入研究者的“数据库”当中。然而数据的突然增长必然会带来不准确性,但事实上这种不准确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也是通过大数据技术能够主动去避免的。对微观小范围的教育而言,最基本、最重要的就是减少错误判断,积极帮助小部分人群树立反映一定范围内群体人特质的价值观。但这对宏观领域获得并凝练群体核心价值观意义不大,而且分众的小群体价值观的凝结千差万别,在小群体孕育的特色文化、特殊的价值观念一旦上升至整个国家、社会层面就显得捉襟见肘。另外,将分众的价值观念凝聚成国家与社会的核心理念又是对部分的价值认同的二次加工,两次提炼过程难免增加了研究结果“失真”的风

险;还可能遇到两次提炼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的差异。因此,如果未来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力求在更加“顶层”的设计来实现,那么大数据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技术手段。

在大数据技术范畴内,研究者一般“需要与各种各样的混乱做斗争”,“混乱,简单地说就是随着数据的增加,错误率也会相应增加。”^{[6]38}所以,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通过大数据技术关注的受教育者数量的急剧增加,以及单个受教育者信息数据的极大丰富且各式各样,使得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思想行为判断的错误率可能会上升。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信息的采集,这种“混乱”反而让教育者可以在大量的信息当中通过“概率”来判断受教育者未来行为的大致趋势。因为大数据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我们并不急于要求找到“确凿无疑”的证据,“收集到的数量庞大的信息让我们放弃严格精确的选择变得更为划算。”^{[6]38}利用大数据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如果能够事先采集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素质方面的发展需求,不但对人群总体的思想政治发展现状有个比较清晰的掌握,而且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也可以反映出单个受教育主体当前及未来可能做出的思想和行为决定,然后有针对性地“对受教育者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影响”^{[2]324},促使受教育者在内心产生思想和心理的矛盾运动,最终达到社会所期望的思想政治素质发展水平。而且,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在基于大量数据的基础上,完全可以针对不同的个体根据其思想政治发展水平的高低实施差异化的教育策略,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这一做法符合大数据分析技术所带来的根据个体的认知水平制定发展的个性化方案。

(三)大数据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多地关注“是什么”而非“为什么”

“知道‘是什么’就够了,没必要知道‘为什么’”是大数据分析的一个重要特征。换句话说,人类对普遍联系的事物将从以往的过分注重“因果关系”转向对“相关关系”的青睐。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也是如此,找到事物之间的关联物往往比找出因果关系更加重要。“相关关系的核心是量化两个数据值之间的数理关系”^{[6]71},一个数据值增加时,如果另外一个数值也随着增加,这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关联性。比如要调查青年学生对“四个全面”战略的关注程度,就可以从特定范围内青年学生在搜索引擎中使用“四

个全面”作为搜索词条的频次中去找到答案。

大数据分析的一个核心功能在于预测。如果没有预测功能,大数据分析与小数据时代的统计分析就没有质的区别。“建立在相关关系分析法基础上的预测是大数据的核心。”^{[6]75}一个人思想政治方面出现发展障碍,不会是瞬间发生的,而是有个逐步发展的过程。通过收集个人所有的数据,我们可以预先捕捉到单个人在思想政治、价值观等方面出现异常的信号。比如说某学生成绩很差,考试时常不及格,平时很少与同学交流,父母时常责骂,入校后时常失眠难以入睡;心情时常低落,对学习缺乏兴趣,总觉得别人瞧不起自己……此时通过对该学生思想和行为的数据收集,经专业人员的分析就可以预先判断该学生已经有患抑郁症的前兆,情况严重还可能因为某事件的突然暴发而走向“自杀”。大数据系统会自动将这些异常的信息与一名正常的大学生日常思想和行为进行比对,从而发现异常学生的存在。通过尽早地发现异常,大数据系统提醒我们在发生重大不可逆转事实之前对学生进行教育(心理)干预,从而避免悲剧的发生。“通过找到一个关联物并监控它,我们就能预测未来。”^{[6]79}这是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无可比拟的优势。因为建立在“相关关系”基础上的“预测”永远比事情发生后寻找“因果关系”更加重要,也愈加有价值。

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专家,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认为人有两种思维模式,“第一种是不费力的快速思维,通过这种思维方式几秒钟就能得出结果;另一种是比较费力的慢性思维,对于特定的问题,就是需要考虑到位。”^{[6]85}快速思维模式偏向于用“因果关系”来看待世间万物,所以以往我们在辅导青年学生时总寄希望于找到学生在价值观、人格、政治素养等方面出现问题的原因,而对这一原因的认识又往往是在事情发生之后。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这种滞后性是时常存在的,实际上这种“经常凭直觉而来的因果关系”^{[6]85}并没有帮助我们很成功地去缓解青少年成长的烦恼,还助长了我们的惰性,不喜欢“慢条斯理的思考问题。”在教育过程中,“因果关系”的认知捷径总使我们的工作陷入理解的误区。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时,我们时常被要求带着“问题意识”进入工作当中,事实上前提是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如何得出?如果仅仅靠小数据的统计分析或者研究者的苦思冥想就开始

教育的实践,那么教育的内容、方式可能是受教育者难于接受的,甚至引发反感。比如有些宣传工作中出现的“形式主义、走过场”的宣传与教育,这类事情多了,久而久之青年的政治热情逐步淡化,受教育者可能对国家和社会希望实现的思想政治目标并不感兴趣。庆幸的是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让我们找到了消除“惰性”、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前沿并可以对思想政治教育素质的发展作出“相关性”的预测。这种预测结果将极大地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从业者发现受教育者的细微变化,及时做到“防患于未然”。

思想政治教育的这种思维转变是大数据分析技术发展的结果。大数据技术一方面使得我们可以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关注受教育者的思想与政治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使得“样本=总体”成为可能并在大量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相关性”,从而实现宏观层面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预测和个人层面的思想和行为的预测。这种预测不是对受教育者的“一味顺从”,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并及时调整教育者的策略。但与大数据分析在其他领域的应用一样,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这种预测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风险,当收集的信息足够多且使用者的目的不正确时这种风险是会给教育带来负面影响的。

四、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风险

对立统一的规律告诉我们,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大数据技术带来的思想政治教育思维的转变让我们看到了数据的价值潜力,这极大地刺激着教育者“进一步采集、存储、循环利用”^{[6]195}受教育者的个人数据。数据的爆发式增长必然带来我们预想不到的威胁。首先,受教育者的个人隐私完全暴露于教育者面前,如果监管不到位、或者教育者滥用于商业用途、或者数据被窃取都可能产生隐私外泄的风险。其次,大数据具有的预测功能使得我们可以对个人的行为作出预设性判断,这种判断可以是教育者进行教育干预的论据,但倘若运用不当,受教育者出现极大的偏见或者代表某一集团的利益,这种预测功能就可能沦为某些利益集团控制他人的手段,严重则危害受教育者的人身安全。数据被采集之后,个人隐私就被拥有者完全掌控,通过技术很难做到“匿名化”,况且对于单个个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如果出现异常情况,本身就希望能够找到这一受教育者并及时地对其进行教育干预以免更大损害产生。再次,大数据的普遍应用很大一

部分功能要通过互联网实现,而互联网的使用“促使大学生在网络上余留的痕迹更易被监视和追踪。”^{[8]112-117}例如,搜索引擎记录下了搜索者的历史记录,购物网站获得了用户的购物习惯,社交软件在更加广泛地获得(微信等)了使用者的地理位置、消费习惯、生活作息、收入水平、投资习惯等等。一旦这些数据被采集并滥用于其他政治目的,就可能对主流的社会核心价值观构成威胁。我们不反对个人在文化价值上的多元化取向,但我们必须警惕夹杂在互联网自由世界之下的政治企图。利用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这些交互工具,西方敌对势力可以掀起一场场无硝烟的“颜色革命”,这已经被近年来国际社会发生的事实所佐证。再如,“西方‘慕课’课程与平台在我国的广泛传播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弱化青年学生政治认同、鼓吹‘西方中心’思维方式等诸多新挑战。”^{[7]104-108}在此,并不是说这些交互式工具本身不好,而是在这背后隐藏的政治企图和价值观输入往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青年一代。因此,大数据技术一方面摆脱不了对互联网的依赖,另一方面又使得我们传统的隐私防范技术和法律等都或多或少地会“失灵”。最后,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的预测功能有可能造成受教育者不是因为“做过什么”而是因为“将要做什么”而受到教育者的提前干预。受教育者可能无法接受这种预测性的提前干预,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个人的自由意志。

五、结 语

尽管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风险无处不在,但新事物的发展总要经历一段曲折的历程。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是新事物发展的常

态。可以预计的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数据、云端存储等技术的进步必然会给21世纪的信息世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在当今“一球两制”的竞争态势下,意识形态的安全较之于传统安全可能更加难以防范。同时,十八大以来我们所力求培育和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新举措。一方面,新时代的大数据技术可以成为我们防控西方势力搞文化入侵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网络新媒体与当代青年相结合所产生的这一代人所特有的生活实践,必然会孕育出以往时代不曾有过的新气象。而积极努力将大数据分析引发的思维变革融入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当中,勇敢地面对和迎接这一划时代的颠覆式变革是我们应有的态度。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 [2] 张耀仙, 郑永廷, 吴潜涛, 等.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 [3] 徐振祥. 新媒体: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机遇与挑战[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07(6).
- [4] 张耀仙.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论[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 [5] 张晓川. 百年中国梦[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 [6] [英]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肯尼思·库克耶. 大数据时代: 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 [7] 高地. “慕课”: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挑战[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5(3).
- [8] 王莎, 杨扬, 杨航. 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述评[J]. 大学教育科学, 2015(3).

Change in the Way of Thinking Politics Education in Big Data Era

Ji Hui-bin^{1,2}

(1.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22,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The rise of big data technology change triggered in the human way of thinking has changed the way of human daily lif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data analysis has to face the big challenge, and big data analysis techniques used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the corresponding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Three features and big data technologies like big data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lso have the “sample = total”, “Allow inexact” and concern “relationship” of the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course, big data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lso faces some risks, but actively strive to meet the changing information age, the way large data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thinking is the attitude we should have.

Key words: Big Data; Politics Education; Thinking

[责任编辑: 哲 文]